

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 以曹振彦生平为例*

黄一农

摘要：在曹雪芹家族移居辽东的先祖当中，曹振彦最为人所知。曹振彦奠定了曹氏约百年的风光家业，唯先前对其生平事迹的论述仍有许多讹漏之处。透过数位数据库以及满文档案等，曹振彦所任教官、致政、旗鼓的位阶与职掌，其入关后的科名、历官以及所属佐领等事，均可获得较深入的看法。振彦与其父辈或在天启元年沈阳城破时被俘归旗成为包衣；初应隶正黄旗，后归新旗主多尔袞，十一年八月随多尔袞改旗而隶镶白旗。先后任教官、致政、旗鼓（长史）等职，顺治元年之前，或遭“缘事革退”。清朝入主中原之初，曹振彦举家迁往北京，于顺治三年受田顺天府宝坻县之西。稍后因考取八旗贡士而得以东山再起，七年获授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八年二月，因多尔袞被追论削爵，正白旗遂遭皇帝收归自领，曹家自此成为上三旗包衣；九年，升阳和府知府；十二年至十五年，历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卒年不详。曹家于清初崛起的历史图像，由此较为清晰而完备。

关键词：《红楼梦》 曹雪芹 曹振彦 清史 曹学

作者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

一、前 言

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民国10年（1921）发表后，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典范（paradigm）阶段，许多学者相信《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名霑）的自叙体，故致力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认为“《红楼梦》是以曹家史实及雪芹个人经验为骨干和蓝本，然后加以穿插、拆合”，期盼能因此理解《红楼梦》的主题与情节，此一趋势令原本属于文学领域的“红学”延伸出博物院史学范畴的“曹学”研究。^①曹学在曹雪芹籍贯论争一事达到巅峰，除大量相关论文外，迄今竟然已有十几本专著书探此事，^②但依旧众说纷纭，“辽阳说”、“丰润说”等相

* 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定宜庄教授与刘小萌教授、台北“中研院”赖惠敏教授与陈国栋教授、新竹清华大学卢正恒同学的协助。

①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增订再版，第1—8、41—42、77页。

② 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刘继堂、王常胜主编：《曹雪芹祖籍在丰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冯其庸、杨立宪主编：《曹雪芹祖

互辩难，唯因各有弱点，且又牵涉主观的地方意识与庞大的观光收益，以致各持己见，无法达成共识。对有些学者而言，此一发展似已到了反客为主的地步；但不可否认，由于曹学受到重视，也增强了大家对先清史的兴趣与认识。然因相关论著多如牛毛，少有人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研究成果，故有些治曹学者往往一人一号、各吹各调，且其叙述有时也会脱离史实。

笔者虽是红学的门外汉，但因在研究明末清兴以及西炮传华的历史时，意外接触到学界有关曹雪芹先祖（有误认其为红夷大炮的教官）的论述，而开始研读相关材料。依照最近的析探，笔者发现在从吴桥兵变（1632—1633）以迄三藩之乱（1673—1681）的半个世纪中，包含曹氏家族在内的大量辽人（此一名词在明末即已行用，专指定居关外的汉人），迅速崛起于军事和政治的主舞台，并从边陲进入内地，协助清朝统治省级以下的各层行政单位。^①因“国方新造，用满臣与民阍，用汉臣又与政地阍”，谙习满汉语文、典制与民俗的辽人遂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如在顺治朝的18年当中，辽人即占全国总督和巡抚的约77%，布政使与按察使的48%，道员的34%，知府的39%，州县正官的21%。^②为透过较典型的个案以及较深入的研究，更清楚掌握此一特殊现象，笔者决定以曹雪芹先祖在明末清初的发迹历程作为具体案例，希望能充分运用红学界先前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尝试能否对曹学有所贡献。

根据网路上提供的资料，过去十年间汉学界共有约30余本研究《红楼梦》的博士论文完成，但其中竟无一与曹学相涉，这与资深学者间沸沸扬扬的论争形成强烈对比。此或由于年轻一代多认为曹学的学术门槛颇高，因其中牵涉许多跨领域的知识，且在先前学界铺天盖地的资料搜寻下，评估在短期内难有重大突破。尤有甚者，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③曹学研究社群中火药味浓厚的派别之争，可能亦导致年轻学者不敢踏进这块学术界的雷区。

其实，史学的研究环境在最近几年已发生滔天巨变。笔者在拙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首揭“e-考据时代”的出现，指出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数位资料库的普及，一位文史工作者往往有机会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在较短时间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填补探究历史细节时的隙缝。^④亦即，我们开始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十分陌生但又梦寐以求的环境，且或已经有条件提供新曹学蜕变的

籍在辽阳》，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李奉佐：《曹雪芹祖籍铁岭考》，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李奉佐、金鑫：《曹雪芹真祖地铁岭》，铁岭：中国铁岭曹雪芹研究会，1998年；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王畅、冯保成主编：《曹雪芹祖籍论辑》，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李奉佐、金鑫：《曹雪芹家世新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万淑明等编：《曹雪芹南宋始祖发祥地武阳渡》，南昌：政协江西南昌县委员会，2002年；冯其庸、杨立宪主编：《曹雪芹祖籍在辽阳（续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梅华：《曹雪芹祖籍在进贤考》，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 ① 辽人包含清朝入主中原之前的大多数汉军以及八旗满洲内的尼堪，参见黄一农：《吴桥兵变：明清鼎革被忽视的一条重要导火线》，审稿中。
- ② 参见渡边修：《顺治年間（一六四四—一六〇）の漢軍（遼人）とその任用》，石橋秀雄編：《清代中國の諸問題》，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年，第181—204頁；孙静：《“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82—86頁。
- ③ 刘梦溪：《〈牡丹亭〉与〈红楼梦〉：刘梦溪论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246—310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1頁。
- ④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44、63—64頁；黄一农：《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兼答熊熙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第141—166頁。

动力。

笔者因此将尝试从先前学者所奠立的丰实基础出发，带入新史料和新视角，并透过系列论文重新梳理曹雪芹的家世与籍籍，^① 希冀能以此作为 e-时代中历史考据的范例。下文即先就其高祖曹振彦的生平事迹提出一些新的看法，^② 由于初涉曹学，对相关背景知识和二手研究的掌握还不够全面，肯定出现许多不周全或错误之处，但深盼透过理性的批评与对话，能引发更多文史工作者进行跨领域的学术激荡，群策群力扩展并深化曹学的研究。

二、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重探

现存辽阳博物馆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原在辽阳旧城南门外的喇嘛园。碑阳刻有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敕命为西藏大金喇嘛禄打儿罕囊素修建舍利塔的记述，碑阴则有参与建塔者的题名。此不仅是先清时期现存最早有关喇嘛教的碑文，且是最早的无圈点满文碑之一，故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语文学上均弥足珍贵。^③ 更因碑上出现曹雪芹先祖之名，而广受红学界重视。

天命六年（1621），囊素从蒙古转至金国传教，但不幸于数月后圆寂，当时努尔哈赤虽欲“修建宝塔，敛藏舍利”，唯因“累年征伐”，只能于翌年在辽阳城南先设一临时小庙，至天聪四年始在囊素之同门法弟白喇嘛（？—1637）的请求下建成舍利寺塔，并于四月落成时刻石纪念。这块石碑的碑阳为满汉合璧，碑阴则刻有大量汉字人名（参见下图），^④ 包括喇嘛门徒瓮卜等 40 多人，侍奉香火看莲僧（应相当于庙祝）大成等 11 人，西会、广佑、慈航、大宁等寺之僧人信海等 28 人，^⑤ 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官 45 人，教官高应科等 18 人，千总房可成等 4 人，以及各式工匠数人；此外，还有好几处于稍后分次加刻的人名。^⑥

据冯其庸先生的调查，1934 年成书的《奉天通志》上首次录出此碑文字，唯错误颇多，如将碑阴第 16 行的“教官……曹振彦……”，误辨成“敖官……曹振……”，此误在三年后出版的《满洲金石志》上虽获订正，但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邹宝库和曹汛等先生才发现碑上的教官曹振

① 如黄一农：《曹孝庆家族在江西迁徙过程新考》，《清华学报》（台湾），出版中。

② 先前研究如朱淡文：《曹氏家族年谱简编》，《红楼梦学刊》1990 年第 2、3 辑；刘上生：《曹寅与曹雪芹》，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8—21 页。

③ 李勤璞：《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满语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④ 改绘自曹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物》1978 年第 5 期。部分细节则根据李奉佐、金鑫所著《曹雪芹真祖地铁岭》书首之碑文照片微调（如“皇上侍臣”的首字并未高一格、“教官”与“高应科”中间未空一小格等等），以求更接近原件。至于“教官”和“曹振彦”等字，则根据 2010 年 6 月卢正恒同学在辽阳博物馆所拍之照片。

⑤ 冯其庸先生不慎将“西会、广佑、大宁、慈航寺僧”等字误作“西僧广佑、大宁……”，而前三寺已可确定是当时辽阳地区重要的佛教道场。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增订本，第 292 页；梁戈峰：《〈千山剩人禅师〉补记》，《乡土》（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刊）第 18 期，2008 年，第 37—40 页。

⑥ 此段参见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0 期，1998 年；Tak-Sing Kam,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s Mission to the Manch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 no. 2, 2000, pp. 161-176. 李氏认为看莲僧共十名，最后两位是宽伏与童祖俊。

彦原来就是曹雪芹的高祖。①



辽阳博物馆所藏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右上为碑阳拓片及其汉字的摹写，右下为碑阴拓片，右中为碑阴汉字的摹写，圈出之字则均为稍后另加刻的。

至于碑阴所臚列的其他教官，目前仅确定查得排在第五的王之哲一人，他于崇德元年（1636）六月担任都察院理事官时，皇太极曾考较内三院的学士、举人、生员，都察院的参政，六部的启心郎、赞礼官、管仓生员、税课生员，王氏当时被评为第一等，获赐人六户、骡一、牛二、驴一，唯旗籍和其他事迹多不详。②

而碑阴上所列的45名各御以上官员，其排序或主要依官阶以及资历决定。如排名在最前的马登云（应作“麻登云”）和黑云龙，乃天聪三年十二月降金之明总兵，他俩是当时被金国俘虏的最高阶明将，其下各人先前原亦多为明朝的偏裨，故麻、黑二人虽尚未被皇太极正式授职，

① 周汝昌与冯其庸等先生对碑文中“教官”或“教官”两字的辨识各有坚持，但若从文本内容（见后文）、字形特征与排列位置（此两字较前后其他各行之人名均高一阶，且与其下之人并无人名间通常有的空隙）等角度综合判断，应该是“教官”。且若释为人名“教官”，亦很难理解为何“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温台十、木青、乞力干”等名与其下之人名有相当的距离。参见曹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物》1978年第5期；周汝昌：《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66、286页；冯其庸：《〈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考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期；梁戈峰：《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历史探求：读史偶得之三》，《乡土》第19期，2009年，第3—11页；李广柏：《红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67—673页；丘华东：《关于“教官、教官”之我见》，2004年7月14日，转引自 <http://www.openow.net/details/e16579.html>。

② 中华书局本的《满文老档》将此人音译作王世哲，参见《清太宗实录》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清代其余各朝实录均同此本，第383页；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13—1614页。

但金国为加以笼络，仍尊重其原官衔。^① 排在其后之名单亦大致依官阶序列：石国柱以下为副将，金砺以下为参将，祝世昌以下为游击（祝世胤以备御附于兄旁），吴裕以下为各御。

又，碑上的教官是否与佟养性统领的红夷大炮炮队相关，一直未有共识。查天聪五年元旦的朝贺礼中，由佟氏所率的汉官和生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进入金国统治核心的庙堂。正月初八日，皇太极殷切盼望的首门红夷大炮终于成功铸成，他因此于二十一日谕负责督造的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将独立成旗的汉兵交由佟养性管理。^② 该新旗有称之为“佟养性所率旧汉兵”者，此因当时习惯以领旗将领之名称呼各旗，故在《旧满洲档》中亦屡见径称为“佟养性旗”者。^③ 唯佟养性旗中一些旧汉官，可能均是自各旗借调而来，他们应仍籍隶其原属的八旗满洲。^④ 佟养性旗的成员初期主要负责后勤和工程等事务，后则加入操炮之重责。此一由佟氏所领导的任务编组，在正式成旗之前应已大致出现，而《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上的汉官名单，应就是此一群体的主要成员。

佟养性在天聪五、六年间，先后共督铸成红夷大炮7门，获赐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而此前金国只曾于天聪初年在辽东海边发现一门冲上岸的西洋制大炮，赐名为“镇国龙尾大将军”。^⑤ 因知前述之王之哲和曹振彦等人，在刻碑时既不属于“佟养性乌真超哈部队”，也不是“红衣大炮部队的教官”。

先前学界多主张《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上的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以及教官，都是因舍金做功德，才留名碑上。^⑥ 笔者对此的看法不同，因在同年九月所刻的《重建玉皇庙碑记》上，可发现几乎同一批汉官列名其上，^⑦ 他们应不可能对喇嘛教和道教都同感兴趣到均愿意捐资助建，且颇难理解为何捐款的官员当中竟然绝少满人或蒙人。倒是瓮卜等40多名喇嘛门徒，较有可能是因出钱出力而列名其上，^⑧ 若他们仅是因曾受戒于囊素师兄弟而列名，很难想象这批教众的质与量（如小保子、王厨子、小倪子等人似均属市井小民）会令皇太极如此重视。

或因该工程主要是由汉人施作，故列名在碑阴上的前述官员多为旧汉人。由于建塔的工程不大，并无需动员如此多之官员实际参与，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或只是列名，既不一定为当地人，也不必身在辽阳。^⑨ 因该塔的建立奉有“皇上敕旨”和“八王府令旨”，^⑩ 人力和物力的支

① 黑云龙于天聪五年九月乘隙逃脱，而麻登云则在七年十月始获授为三等总兵官。参见《清太宗实录》卷9，第135页；卷16，第214页。

② 此段参见《清太宗实录》卷8，第1—3页；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王钟翰主编：《满族史研究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306页。

③ 《清太宗实录》卷9，第133页；卷11，第157页；张威等译注：《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0年，第237、243、245页。

④ 杜家骥：《清代八旗领属问题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

⑤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曹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物》1978年第5期。

⑦ 曹汛：《〈重建玉皇庙碑记〉曹振彦题名考述：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考证之四》，《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⑧ 碑阴首行或是该教地位较高之僧侣，次列齐榜识（名国儒）和索尼榜识等官员，接着则为一般教众，其中榜识（baksi）又译作巴克什，乃指文臣。参见《清太宗实录》卷9，第124页；李勤璞：《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⑨ 李奉佐、金鑫：《曹雪芹真祖地铁岭》，第2—13页。事实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和《重建玉皇庙碑记》两碑上的几十名中高阶官员，不可能长达一年多均待在当地参与这两个小工程。

⑩ 周策纵先生误“八王”为八贝勒阿济格，其意应指八旗各贝勒，此在满字碑文中尤其清楚；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第7页。

援可能十分充足，故从奏请到完工前后不到三四个月。负责撰文记此事的是游击达海（亦作大海）和杨于渭，其中达海为满人，自幼精通满汉文，虽为文臣，唯因金国的文官体制尚未建立，故其官衔仍循武职。至于工程，则是命驸马总镇佟养性总其事，并由备御蔡永年率房可成等四名千总负责督工。^①

笔者怀疑此塔的实际施工或由麻登云和黑云龙率新被掳之汉人承担，此一情形颇类战俘所常从事的苦役。天聪四年五月的《实录》中有云：“赐总兵官麻登云、黑云龙银、缎、貂镶朝衣、貂裘、帽、靴、雕鞍、弓矢、器皿等物。”^②不知是否有部分原因乃为奖赏两人建塔的劳绩？

诸官员和工匠在《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上留名的目的，另有以示负责之意。由于该塔或仍有一些后续工程进行，故碑上还分几次加刻上几组人名。其中“游备郎位、郎熙载、臧国祚”一行，因郎熙载（亦作郎希载，为郎位之侄）于崇德元年正月病故，^③知应刻于之前。至于“皇上侍臣库滴、义马哈、龙十、偏姑、温台十、木青、乞力千、□□、何不利”等人，其中库滴（或即库商、库尔缠）^④与龙十（龙什）乃于天聪七年六月和九年二月分别被革退，知该行应刻于天聪七年六月之前。^⑤

又，皇太极于天聪八年四月下令易官名为满语，副将之名因此被改成梅勒章京，参将变成甲喇章京，并称“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而佟一朋（佟一鹏）乃在同年五月始正式袭三等梅勒章京，^⑥疑碑阴的刻字者或不知新规定的存在而有此误。亦即，此时应仍在新法的缓冲与适应期，而“柯参将、杨旗鼓、马应龙、陈五、金世遼（衣按：字形亦颇近金以选）、副将佟一朋、韩尚武”等字，应最可能刻于天聪八年五月后不久。^⑦至于与木匠、铁匠排在同一位阶的“炮塔泥水匠崔果……”等字，^⑧则应刻在“柯参将……”之前；否则，后者完全可以刻在一行，而不必分两行填满尚余的空隙当中。

此外，碑阳所见“都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总兵尚可喜 [喜]”三行字，则应刻于天聪

① 佟养性于天命六年从克辽阳后，即因功进二等总兵官，参见《清史稿》卷23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9323页。又，由于在碑阴列名的官员当中，千总的官阶最低，但人数反而甚少，知房可成等四千总最可能为实际督工之人。

② 《清太宗实录》卷7，第98页。

③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1362页；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91页。

④ 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

⑤ 偏姑（篇古）与木青（穆青）为宗室，温台十（温台什、温塔石、温台石）尝出使朝鲜和明朝。参见《清太宗实录》卷7，第105页；卷14，第199页；卷15，第206页；卷22，第298页；卷46，第611页。《清史稿》卷161，第4712页。《明熹宗实录》卷79，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景印旧钞本，第3839页。

⑥ 《清太宗实录》卷18，第237页；《清史稿》卷173，第5980页。

⑦ 先前学界多将金世遼与韩尚武两名视为原刻之一部分，唯因其字体相对较小，且该说将颇难解释为何两者中间空出相当于两人名之间隔，故笔者怀疑“柯参将、杨旗鼓、马应龙、陈五、金世遼、副将佟一朋、韩尚武”等字应均是稍后加刻的。如此，在原刻中的各种匠役即可依其位阶合理且整齐地排列在四名千总之下。

⑧ 有疑此人为崔果宝（崔果保、崔国宝），他稍后亦曾参与建造在盛京的其他寺庙。参见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

八年四月至十年四月间，^①当时孔、耿二人驻辽阳，尚可喜驻海州，^②故或被要求就近补施工，他们在竣工之后，也欲留名碑上，由于当时佟养性已过世，^③且孔有德的官阶在养性之上，故他们选择在碑阳不低于佟养性姓名的空白处，加上三人的名字；所刻“都元帅”、“总兵”之位置，亦较佟养性的“总镇”为高。总言之，此碑上所有刻字的时间应均不晚于崇德元年正月。^④

三、曹振彦所任教官与致政小考

近30年来，红学界虽努力追索曹雪芹先祖们的入辽事迹，但对“教官”的含义仍没有共识。如曹汛先生称：“曹振彦原来作教官，隶佟养性，为汉军官员。当时的汉军称乌金超哈……也就是使用红衣大炮的部队。曹振彦在这支部队当教官，无疑是炮兵教练官。”^⑤李广柏先生在参以许多先清史料后，力证：“曹振彦没有做过作战部队的军官……担任旗鼓牛录章京是充当（镶白旗满洲）包衣的头目。”^⑥冯其庸先生则在未讨论李说正误与否的情形下，仍主张：“曹振彦是佟养性乌真超哈部队，即红衣大炮部队的教官当是无可怀疑了。”^⑦

在现存皇太极时期的文献中，曹振彦除以“教官”身份见于天聪四年四月所刻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外，同年九月刻的《重建玉皇庙碑记》上，他是“致政”项下27个人名中的第12位，仅有的另一位同见于两碑之人为冯志祥，生平事迹不详。再者，天聪八年四月的《清太宗实录》记曰：“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⑧曹振彦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就从教官变成致政、旗鼓牛录章京，笔者怀疑此三职位之间或有密切关联。而欲理解这些官衔和职称的内涵，或许我们得先从金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着手。

查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清太宗实录稿本》[此为顺治九年（1652）敕修汉文实录初稿之残本]，皇太极曾于崇德元年五月下谕：“皇帝敕定驾下旗鼓及王贝勒旗鼓，今后俱不许称旗鼓。驾下旗鼓，满洲称凡担章京，汉人称旗手卫指挥；王、贝勒旗鼓，满洲称摆塔大，汉人称长史。”^⑨其中的凡担章京（faidan i janggin）专指“汗宫内旗鼓（han i boo i cigu）”，“凡担（faidan）”即仪仗之意。^⑩至于旗手卫指挥，原为明代官名，其职掌之一是要在每年的固定时日

① 因天聪八年四月授新归附的尚可喜为总兵官，十年四月，则封都元师孔有德为恭顺王、总兵官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8，第238页；卷28，第373页。

② 《清史稿》卷234，第9397、9409页。

③ 应卒于天聪七年，参见黄一农：《红衣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④ 天聪五年，明监军张春在大凌河之役被俘，皇太极将其软禁于白喇嘛驻锡的沈阳三官庙。崇德五年十二月，张春绝食死，被移葬于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的舍利塔园。而稍早于二年正月在三官庙圆寂的白喇嘛，有疑亦是迁葬于同一处。但因二人死亡的时间较晚，故应与此碑上的人事均无关。参见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

⑤ 曹汛：《〈重建玉皇庙碑记〉曹振彦题名考述——曹雪芹家世碑刻史料考证之四》，《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

⑥ 李广柏：《曹振彦的旗籍》，《红楼梦研究集刊》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7—380页。

⑦ 冯其庸：《〈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考论》，《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5期。

⑧ 冯其庸：《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的梳理和透视》，《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期。

⑨ 《清太宗实录稿本》，李燕光点校，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第31页。

⑩ 瀛文老档研究会识注：《瀛文老档》，东京：东洋文库，1961年，第6册，第1034页。感谢定宜庄教授的提示。

代表朝廷至特定地点祭旗纛。^①而曹振彦在亲王多尔袞属下所担任的旗鼓，满文音译作摆塔大(baitai da)，乃拜唐阿(baitangga)之首领，《清文鉴》释拜唐阿为“作公事的无品级的小役人”，^②亦与摆塔大作为王府汉姓包衣首领的身分相合，其职事应近乎明朝“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的长史。^③

天聪二年三月至崇德八年十月间由多尔袞担任旗主的镶白旗，当时大概有三个旗鼓牛录，此类牛录之首领，其职称即作旗鼓，初授阶牛录章京(原名备御，天聪八年四月改)，可升授至三等甲喇章京(原名游击)，如《满文老档》在天聪六年六月中即记称“八旗旗鼓官：游击李旗鼓、游击曹旗鼓、备御李旗鼓、备御王旗鼓、备御万旗鼓、备御杨旗鼓、备御沈旗鼓及备御金旗鼓”，又记刘之源曾于十年三月获授为旗鼓三等甲喇章京。^④

明代广设儒学、宗学、社学和武学等教育机构，各学均有教官(此为泛称，而非专门之职衔)，如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且俱设训导，多由足为人师的资深举人或监生担任。各学教官每年可举荐生员(又称诸生或秀才)若干名参加翰林院考试，中式者入国子监为监生，称为贡生或岁贡。宗学之师则由王府中的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择学行较优者除授。^⑤在明朝的典制中，特别安排有长史和教官以辅导亲王，^⑥明宣宗即尝申释曰：“勋戚家有教官，此祖宗所定。大抵勋戚子弟，生长富贵，不知艰难，惟肆骄奢，蔑弃礼法，往往隳前人之业，故特选儒者教之。”^⑦

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首度任命了八名专职的满人师傅(称作巴克什)，以教习各旗子弟，并直接对各贝勒负责；同年亦聘有“在八旗教书的汉人外郎(原文作“尼堪外郎”，nikan wailan)”，当时每两旗设一学，每学各有四名生员教习汉文，此或即所谓的“外郎”；天聪六年，始析设成每旗一官学，各配两名生员/外郎。^⑧

虽然我们现在已很难从先清史料中获知当时有关外郎的细节，^⑨但从清中叶的典制可推判外郎应是八旗特有的低阶文职人员，或由“在学年久”的官学生充任，或从生监(指监生和生员)、官学生、兵丁、闲散人等内，以通过翻译考试者补授。考绩突出之外郎，服务六年期满后得升授笔帖式或外放州县的佐贰官。^⑩亦即，努尔哈赤时期的外郎很可能是由年深且优异的生员担任。

至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上为何出现多达18名的教官，而外郎又与教官有何关系，则或

① 《明太祖实录》卷104，第1744页；沈淮纂修，翟振庆续纂，陈鸿翔续修：《临邑县志》卷6，《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景印同治十三年续补刻本，第9页。

② 参见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辨：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

③ 《明史》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7页。

④ 杜家骥：《曹雪芹祖上之隶旗与领主的多次改变：兼谈曹家旗籍问题》(未刊稿)，“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5，李洵、赵德贵等点校，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9—90页。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第5册，第808页；第6册，第958页。

⑤ 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2—147页。

⑥ 云贵总督张鹤鸣尝批评黔国公沐启元曰：“亲王有长史、教官为之辅导，駉马文庙习礼，仪曹教习……沐镇子孙生于带砺之家，不习礼仪，何知向善。”(《崇祯长编》卷21，《明实录》本，第10—12页)

⑦ 《明宣宗宝训》卷4，《明实录》本，第23页。

⑧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218、286、1338—1339、1345—1346页；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第1册，第463页；杜家骥：《努尔哈赤时期满族文化与教育探略》，《满族研究》1999年第1期。

⑨ 《大明会典》中并无外郎一职，查明代六部之员外郎均为从五品，知此应非员外郎之简称。

⑩ 铁保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50，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景印嘉庆四年刊本，第49—50页；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页；卷85，第25页。

与皇太极开始重视文治的氛围有关。天聪三年四月，金国将先前已设立的书房（后改以较典雅的“文馆”名之）人员分职，命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①同年九月的《实录》中有云：

上谕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母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九月壬午朔，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②

知努尔哈赤曾于天命十年乙丑岁大肆屠杀汉人绅衿，^③此一态度在皇太极即位后始大幅翻转，且于天聪三年九月首度考较全国生员（此应指在明朝统治时期获此资格者），通过考试的200人，分一、二、三等，俱免二丁差徭，并可出奴籍。^④亦即，皇太极藉此次考试以检定前明生员的科名。

天聪三年十一月，金兵入关克遵化，率军亲征的皇太极也曾从俘虏中考选俊秀之儒生，送盛京沈阳的文馆深造，以储备文臣之人才。^⑤五年七月，皇太极更设立六部；八年三月，再度校取汉人生员228人，并分其等第为三等；四月，正式开科取士，取中满、蒙、汉举人16名，各免四丁差徭；十年三月，且设内三院，以完备文官体制；崇德三年，或因满洲既得利益者强烈反弹，不再准奴仆应试，是科通过一、二、三等生员共61人，各授壮达（天聪八年之前称旗长，顺治十七年之后称护军校^⑥）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并取中举人11名，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免四丁；六年，又取中满、蒙、汉举人7名、生员45人。综前所述，皇太极在位期间尝分四次取士，共考得生员534人（以汉人居多），并从中拔取举人34名。清朝立国之初的文职官吏，有许多即从此一途径出身；而已入部任官者，亦积极取得科名，以更上层楼。^⑦

由于天聪四年九月重建玉皇庙时的《碑记》，乃由“儒学生员杨起鹏”撰；且皇太极于五年闰十一月，尝谕令诸贝勒、大臣的子弟，凡8岁至15岁者俱应读书，否则不准“披甲出征”；^⑧知金国在天聪初年应已设立儒学或官学。而随着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大幅增加，各学校想必会增设许多汉人“教书秀才”或教官，^⑨以培养中下层官吏治事理民时必要的能力。

① 赵志强：《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2—165页；神田信夫：《清初の文館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19卷第3号，1982年。

② 《清太宗实录》卷5，第73页。

③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643—647页。

④ 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25，《十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景印光绪间刊本，第5071页。

⑤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0—101页。

⑥ 张玉兴：《明清史探索》，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年，第669—675页。

⑦ 嵇璜等：《清朝文献通考》卷25，第5071页；铁保等：《钦定八旗通志》卷102，第3—4页；《清太宗实录》卷18，第236页；卷28，第355页；卷40，第526—527页；卷43，第567页；卷56，第754页；关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72—73、78、358页。

⑧ 《清太宗实录》卷10，第146页。

⑨ 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史料丛刊初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景印民国13年铅印本，第5页。

依照清初典制,只有八旗满洲才有包衣,八旗蒙古和汉军则无,各旗包衣主要分成满洲佐领、旗鼓佐领、管领下人以及庄头人等类型,其中旗鼓佐领多为汉人,且多集中在上三旗。^①有学者因曹振彦家族并不曾被拔出包衣籍,故认为他应非天聪三年首度通过考试的200位生员之一,^②此一推理过程颇待商榷。当时皇太极乃命“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奴籍;而所谓“包衣下为奴者”应指的是“包衣下奴仆(booi aha)”或“户下奴仆”,此乃八旗内部地位最卑贱的阶层;亦即,当时应非是将这些原在包衣下的生员悉数拔出旗籍为民,而是准其在旗下“开户”,成为旗下的半自由人,且可能仍多隶属于原牛录。^③

至于编入旗鼓牛录的包衣,原虽多为天命时期的明朝俘虏(见后文),但在清帝国肇建与扩张的过程中,其地位也因“效力年久”而水涨船高。他们大多成为“正身旗人”,或称“正户”,既拥有独立的户籍,且为非贱民的“良人”,这些人虽面对皇帝或主家时,仍自贬为“包衣下贱”或“家奴”,但在法律上并非奴仆,与附于旗人户下的大量无独立户籍之家奴截然不同。包衣人与其主家虽世代维持主从关系,但他们在外既可担任官吏,亦可拥有奴仆与财产,故包衣或较贴近于“世仆”、“家臣”,而不应被视同为一般之奴隶。^④

在八旗制度下,旗籍的等级地位并不平等;如各旗的包衣佐领低于旗分佐领,而在旗分佐领中,满洲高于蒙古,蒙古又高于汉军;此外,上三旗包衣高于下五旗包衣。旗下的包衣人因与皇帝或旗主较亲近,往往拥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力,他们除担任内务府所属的职务(许多是公认的肥缺)外,亦可外放为一般官员(甚至有贵为大学士者),但其出身之旗籍并不容易调整,此因“盖世仆也,非特旨不能出籍”。^⑤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钦定八旗通志》,只发现有十几人因是后妃外家或担任都统等高官,而奉特旨出包衣籍,此谓之“抬旗”。

由于皇太极于天聪三年下令“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知曹振彦很可能亦赴考,并因此被拔出奴籍。唯因他旋以“备御曹旗鼓”的身分被多尔袞拔擢在镶白旗王府中任职,负责管理一个包衣牛录,此职与旗主的互动密切(见后文),且当时金国所拥有的牛录亦不过两百多个,^⑥故笔者怀疑诗书传家的振彦,^⑦应早于天命六年至天聪三年间即已在两白旗的官学中担任外郎,并于天聪三年通过金国对生员的检定后升任教官。当时可能一次拔擢了不少表现较佳的生员担任教官,而许多原任外郎者并未能全都升授,如从天命六年起即在两黄旗教书的刘泰与邵姓生员,就于天聪六年被裁汰为差役。^⑧

从天聪四年所刻《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上的排列次序,知教官的位阶应介于千总和备御(天聪八年四月,改称牛录章京)之间。由于当时金国的官制几乎全以武职为主,疑教官或是其文官体制酝酿初期所出现的新衔,其位阶应高于授四分之一牛录章京的千总,^⑨但低于授半个

① 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兼论一些有关包衣的问题》,《食货月刊》第12卷第9期,1982年。

② 何锦阶:《曹寅与清代社会》,香港:青文书屋,1989年,第70页。

③ 刘小萌:《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分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3期。

④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5—489页。

⑤ 周广业:《过夏杂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景印清钞本,第541页。

⑥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⑦ 如康熙《江宁府志》中即称曹玺“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第191—192页。

⑧ 杜家骥:《努尔哈赤时期满族文化与教育探略》,《满族研究》1999年第1期。

⑨ 当时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参见《清太祖实录》卷7,第97页。

牛录章京品级的举人。查当时叙战功时，对第三位登城者即常授予三分之一牛录章京，第二位授三分之二牛录章京，最先登者则授一个牛录章京，^① 因疑教官的品级很可能相当于三分之一牛录章京。

至于《重建玉皇庙碑记》上的“致政”一词，有认为即通常所称的退休，然因曹振彦时当壮年（见后文），故笔者怀疑“致”在此乃获得之意，类同《论语·子张》中“君子学以致其道”之用法。天聪朝前期，“致政”一衔或主要给予获得从政资格之汉人文士，其人应具备满汉双语的沟通能力，且通过类似明代对新科进士所施行的“观政”实习制度。^② 事实上，明朝也曾令都察院选进士、监生或教官中堪任御史者，先于各道“历政”三个月，再将优异者给授御史。^③ 又，曹振彦应是在参与重建玉皇庙之后，始凭借其历来的劳绩和表现获授旗鼓牛录章京。

四、曹振彦任官旗鼓牛录章京考

金国之旗鼓应是袭自明朝的官衔，明军中虽屡见旗鼓一职，但却不见于典制，疑其应非属编制内，乃带兵官自行任命，有时亦兼管家丁。^④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南京兵部尚书王遵条议营务，称现有新旧官军 23000 余人，以每 3210 人立为一枝，共可分成七枝，余者“置之旗鼓下，作为备兵，专听各营缺军取补”，当时各总兵、巡抚或监军等高级官员之下即多设有旗鼓官，为直属之亲军，其地位次于中军，官阶则低于游击。^⑤ 其职事主要在申号令、掌仪仗，平时协助总兵署的行政与庶务，战时亦须前赴战场。^⑥

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赐备御以上官员小旗、伞、鼓、喇吧、喷呐、箫等物，其品项和数目依级别而有所不同，并下令“诸申、汉人各官出城时，均照汗所定礼制，乘轿……击鼓、吹喇吧、吹喷呐，妆饰而行；于汗城内，只准执旗而行……凡汗赐以职衔之大臣，皆举旗、执伞，显示身份而行”。^⑦ 金国出现负责处理仪仗等事务的旗鼓官可能不晚于此。唯因当时汉人多不得与闻机密，亦多不参与冲锋陷阵，故旗鼓的职掌或因此局限于提供王府中以及八旗下的各种总务或后勤支援。

亦即，曹振彦所担任的旗鼓牛录章京，应非带兵打仗的武职，而是负责管理王府中专供役使的汉姓包衣。^⑧ 天聪四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全国壮丁，有隐匿者俱坐以应得之罪，谕旨并

① 有学者认为清初应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之数词，而该如《清实录》称作“一分牛录章京”和“二分牛录章京”，但因“一分牛录章京”加二分或“二分牛录章京”加一分，均可晋为牛录章京，知此或可视为意译。参见关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 113—114 页；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研究》，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9—20 页。

② 曹斌：《明清观政进士制度及其特点》，《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③ 《明宣宗实录》卷 46，第 1123 页；卷 48，第 1179 页；卷 53，第 1276 页。

④ 何锦阶：《曹寅与清代社会》，第 30—32 页。

⑤ 《明神宗实录》卷 137，第 2559—2560 页；卷 321，第 5963、5966 页；卷 503，第 9560 页；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 15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 年景印万历十五年刊本，第 2211 页。

⑥ 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铨司》卷 19，《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崇祯间刊本，第 103—104 页。

⑦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 297、300—301 页。

⑧ 李广柏：《曹振彦的两个职务》，《红楼梦研究集刊》第 6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称各贝勒之摆塔大如因此犯罪的话，俱“鞭一百，革职”，^① 知旗鼓乃负责总管各旗贝勒所属汉姓包衣之具体事务。

又，天聪五年九月，皇太极在大凌河外大破明总兵官宋伟的援军，并掳获包括红夷炮在内的大量火器，遂命八旗各拨取留守沈阳的汉兵百人，携带麻绳前来捆载战利品，中称：“若有旗鼓，则令旗鼓率领前来，以掌所获炮位”，^② 证明各旗鼓应非第一线战斗部队的军官，且不必然会随旗主出征。此外，天聪九年六月，因修筑城垣时由镶红旗、镶蓝旗、正蓝旗所负责的区域不够坚固，除将各旗的固山额真或代理者罚银外，亦将贝勒下的旗鼓等官俱坐以应得之罪。^③ 知旗鼓除总管王府事务外，还得协助处理各旗所分配到的非战斗任务。

曹振彦究竟因何功而于天聪八年四月加半个前程，先前学界多臆测是在大凌河立了军功。然皇太极曾于天聪六年正月和十年二月两度叙诸将在该役之功，均未见振彦之名；事实上，其中亦无一汉官因战功而受赏。^④ 且在《清太宗实录》或《内国史院满文档》中，振彦获加半个前程的叙述均仅为一孤立事件，^⑤ 若他是随征立功，应不太可能独获青睐。又，他若只是在多尔袞王府中表现突出，也很难在“八家均分”的氛围下独自加半个前程，因其他各旗亦会替各自的旗鼓争取。

经查先前一年发生在金国的重大事件，乃以孔有德、耿仲明及尚可喜先后率众投降为最，笔者怀疑曹振彦很可能在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先前有孔、耿之部将毛有明来降，即是交多尔袞收养；^⑥ 而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时，亦是有多尔袞、萨哈廉宣敕；至于率兵往迎尚可喜的工作，也是命多尔袞与萨哈廉两人负责，^⑦ 故作为多尔袞属下颇受器重的旗鼓，尤其满汉双语的沟通理应无碍，曹振彦肯定得处理许多相关的具体工作。此外，孔、耿在投降之前，曾遣副将曹绍宗（亦作绍中或绍忠）和刘承租至金国洽谈相关事宜，^⑧ 曹绍宗曾于万历年间担任沈阳中卫指挥僉事，后历升至副将，因其既曾与曹振彦同住在沈阳（见后）且为同姓，疑两家原应相熟，这可能也是振彦得以在前述两重大投顺事件中成功扮演媒介角色的特殊人脉关系。^⑨

崇德元年六月，刑部官郎位被控“贪财好色，不法不义”，遭革甲喇章京一职并追赃，据《清太宗实录稿本》，其罪之一是：“（刑部郎位）断镶白旗长史曹谨言的事要银二十两，又借银十五两……镶白旗长史曹谨言不认与银，将曹谨言打八十鞭子。”^⑩ 任世铎等人于1987年翻译的《满文老档》中亦记此事，称：“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

① 《清太宗实录》卷7，第106页；《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0—11页。《清太宗实录》则将“摆塔大”译成“包衣昂邦”。

② 关孝廉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③ 《清太宗实录》卷23，第308页。

④ 《清太宗实录》卷27，第350—354页；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1198—1215页。

⑤ 关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74页。

⑥ 文献中称毛有明为明都司，当孔有德在吴桥起兵时其兄亦为大帅。查与孔有德同叛的首谋李九成，原用毛有功之名，不知“有明”有无可能为同音之“有名”，且为有功之弟。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4，第192—193页；黄一农：《吴桥兵变：明清鼎革被忽视的一条重要导火线》。

⑦ 《清太宗实录》卷14，第194页；卷17，第229页。

⑧ 《清太宗实录》卷14，第190—191页。

⑨ 笔者将另文详论曹绍宗家族的祖籍与事迹。虽然当时绝大多数的授勋均属在战场上立军功，但正蓝旗满洲的宜拜亦曾于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而授半个前程；参见《清史稿》卷173，第5972页。

⑩ 《清太宗实录稿本》，第53—54页。

为名索银十五两……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①由于旗籍、职衔和时代均若合符节，知此两位相隔三百多年之汉译本中的曹谨言和曹金颜，均应回译成曹振彦才对。^②

此外，日译本《满文老档》将曹氏的满文官衔释读成 *faidan i da*（译作“仪仗的头”），然原档满文应读作 *baitai da*（音译作“摆塔大”）才是，此即皇太极谕令汉文应改作“长史”之旗鼓。^③又，郎位之名曾出现于《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上，在其被控贪渎一案中，列名碑上的白喇嘛、鲍章京（承先）、高章京（鸿中）等人亦被斥责知情不报，^④知他们从盖舍利寺塔以来应仍有不少互动。

天聪八年五月，皇太极叙各官或其祖先之勋绩，并给予世袭敕书，对于只是“因才授职及因管牛录事授职”者，则给不世袭敕书。^⑤曹振彦虽在是年四月因功加半个前程，但应未授世职，此因当时通常只予阵亡之官员世袭，且“文臣例无承袭”。^⑥崇德八年，在摄政的多尔袞主导下，镶白旗与正白旗互易旗纛，此举令多尔袞所领旗的排列位次，仅次于皇帝的两黄旗（稍后并称为上三旗），而曹振彦的旗籍也因此改成了正白旗。^⑦

曹振彦虽在崇德元年因行贿而被拟鞭刑，但档案中并未指出他遭到免职或降阶，何况他还有天聪八年因功所加的半个前程，故他有可能在崇德朝仍持续担任一段时间的旗鼓。唯据《内务府正白旗佐领管领档》，顺治元年该旗鼓改由高国元管理，^⑧参照《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中的叙事，各旗鼓佐领的替换原因主要为过世、外放、抬旗、犯事或因故（如生病、年老）告退，疑曹振彦当时很可能是“缘事革退”。

五、曹振彦入关后的发展

曹振彦在顺治初“扈从入关”，方志中多称其出身为贡士，且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现任官员履历册》中亦称他是“正白旗下贡士”。^⑨贡士乃指会试中式但尚未经殿试授为进士者，唯在入关前的举人名单中从未见曹振彦之名，当时亦无贡士之科名。先前学界对曹振

①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1515—1516页。

② 由于当时镶白旗中拥有类似地位之汉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姓名发音有两字完全相同，一字甚为接近，知其为不同两人之机会应不大。事实上，杜家骥先生早指出曹金颜即曹振彦，但未作进一步研究，曹学界似亦不知此事；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174页。又，庄吉发先生告知满汉对译时读音常难规范，如入关前东北人念汉字“努尔哈赤”与“努尔哈齐”之音即是一样的，故他疑当时东北人或读振为jin。

③ 由于日译本《满文老档》乃译自沈阳崇谟阁原藏之乾隆朝重抄本，而该本是以新满文转写原无圈点档册（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旧称“旧满洲档”，今改作“满文原档”），故疑当时或已将原档中的“*baitai da*”统一改作“*faidan i da*”。感谢庄吉发先生的提示，并参见庄吉发：《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清史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39—74页。

④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第1515—1516页。

⑤ 阿桂、梁国治等：《皇清开国方略》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14页。

⑥ 如文臣达海病卒后，皇太极念其“博览群籍，学问淹通”，乃于天聪七年二月特准其子雅亲降一等袭职，授备御，仍令管理达海原管牛录。史家即评此事曰：“文臣例无承袭。盖异数也。”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3，第181页；卷51，第673页。

⑦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168—187页。

⑧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沈阳：白山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⑨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11—12、372—379页。

彦何时成为贡士的讨论多有疏漏,^① 顺治初期的题名碑录, 虽记三年(1646)、四年、六年曾殿试天下贡士, 并授予进士出身, 但“八旗人士不与”, 旗人乃另行开科取士, 顺治九年始首度策试八旗贡士并赐予进士及第。^② 在此之前, 因政权新肇, 急需补充各省之地方官缺, 清廷遂数次起用从龙入关之辽人, 如顺治六年曾下旨: “八旗汉军通晓汉文者, 无论俊秀、闲散人等, 并赴廷试。文理优长者, 准作贡士, 以州县即用。”^③ 查《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电子档, 发现在顺治元年至七年(曹振彦初任地方官之年)间, 每年均有许多籍隶关外的辽人以贡士身分派往各省担任州县正官, 其中又以山西(知县74人、知州18人)和河南(知县24人、知州4人)两省居多。知曹振彦应是在顺治初年成为“正白旗下贡士”, 唯年份不确定, 或由于他先前已有担任旗鼓牛录章京的从政经历, 故在顺治七年外放至山西平阳府吉州, 担任位阶较高的知州。^④

明代生员于出学任官(主要担任教官和杂职)之后, 通常就不得再参与科举考试。^⑤ 先清虽因袭明制, 但依旧鼓励已任文官者获取科目出身,^⑥ 故曹振彦即使早就从教官出任旗鼓, 仍赴考去争取贡士资格, 希冀能因此有更好的仕途。如已任员外郎的杨方兴以及已任内弘文院学士的王文奎, 即仍以生员身分参加崇德三年八月的考试, 并取得举人资格。^⑦ 曹振彦获授牛录章京的时间虽早于二人, 但杨、王在入关之初却均已位居督抚高位, 此应与他们很早就获得举人的科名有关。

顺治八年八月, 以皇帝大婚, 恭上皇太后徽号,^⑧ 从五品的知州曹振彦遂因“欣逢庆典, 宜沛新纶”, 而覃恩获得奉直大夫之诰命, 其妻袁氏亦被封为宜人, 由于该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诰命中, 屡屡袭用“国家推恩而锡类, 臣子懋德以图功。懿典攸存, 忱恂宜勗”之类的套语,^⑨ 知其当时只是扈从入关的诸多辽人中级文官之一, 身份和影响力均属一般。

顺治九年四月, 曹振彦升授山西省阳和府(在大同东北约50公里处)知府, 至十二年九月始调职; 先前学界则常误以其所出任的是大同府知府。^⑩ 查清大同总兵官姜瓖于顺治五年十二月据城叛, 宣大、山西总督耿焯奔逃阳和, 并移府治至此, 设阳和府; 六年九月, 姜瓖死, 清兵

① 如误将民人与旗人的廷试混淆, 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年增订本, 第181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25, 第211页; 卷31, 第255页; 卷43, 第347页; 卷63, 第498页。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8年景印雍正间刊本, 第480—494页。《清史稿》卷108, 第3160页。

③ 昆冈等修, 刘启端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卷1136,《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光绪石印本, 第635页。

④ 此段参见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 第67—77、81页。

⑤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第262—289页。

⑥ 如宁完我就曾于天聪七月上疏, 建请除秀才外, 亦应命六部官员参加翌年的开科取士。参见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第33—34页。

⑦ 铁保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201, 第1、7—8页。《清太宗实录》卷26, 第342页; 卷29, 第374页; 卷32, 第406页; 卷43, 第567页。关孝康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 第358页。

⑧ 《清世祖实录》卷59, 第469页。

⑨ 此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53年初版, 第206—207页。类似之诰命文字, 屡见于盛昱:《雪履寻碑录》,《丛书集成续编》,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年景印《辽海丛书》民国24年序刊本。

⑩ 如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98年增订本, 第195—196页。唯曹振彦在顺治九年十二月初八日的奏本中即明确记载他是阳和府知府, 此见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 第8—9页。

旋将收复的大同城垣拆除。^①十一年十月，马之先就任宣大总督；十二年十月，马氏从阳和移镇大同，并开始重建复设之大同府，十一月左右，裁阳和府。^②故严格说来振彦从不曾出任过大同府知府。

据顺治十三年四月刻石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知该次修城之议“始于前直指天中薛公讳陈伟，再成于前总督襄平马公鸣佩”，当时因先前战争的摧破，大同城内到处是“颓垣坏垒”，马氏以不到半年时间将之改建成“屹屹金城”。在先前所公布的辨识碑文中，列出几位捐输的官员，当中即包括“□□□襄平曹公讳振彦”，唯从张书才先生新公布的碑记照片，^③知“襄平”两字之前为“守”字，疑尚缺之二字应为“前太”，因曹振彦当时已自知府（太守）离任。

顺治十二年九月，曹振彦升授在杭州的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任内“恤灶抚商，疏引裕课”；十五年四月去职，唯不知是病免、致仕，抑或卒于官。^④由于当时无世职之官常是六十岁退休，^⑤故若振彦当时乃因届龄而离任，则其生年或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康熙六年（1667）十一月，振彦之子曹玺在督理江宁织造任内获覃恩，其祖父世选（锡远）赠资政大夫，祖母张氏赠一品夫人；十四年十二月，曹玺又获覃恩，其父赠光禄大夫，母欧阳氏赠一品太夫人，继母袁氏则封为一品夫人。^⑥再查《五庆堂曹氏宗谱》，记曹雪芹先祖事迹曰：“九世：锡远，从龙入关，归内务府正白旗；子贵，诰封中宪大夫；孙贵，晋赠光禄大夫；生子振彦。十世：振彦，锡远子，浙江盐法道，诰授中议大夫；子贵，晋赠光禄大夫……。”^⑦据清初封赠之典制：存者曰封，歿者曰赠，自身曰授；知州为从五品，授奉直大夫；知府为正四品，授中宪大夫；盐法道为从三品，授中议大夫。^⑧由于振彦之父生前仅封中宪大夫，知其应卒于振彦任阳和知府期间（顺治九年四月至十二年九月），^⑨而振彦嫡妻欧阳氏应卒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之前，其继妻袁氏当时则仍健在。

曹家入关后一直隶多尔袞的正白旗。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袞薨；八年二月，追论其罪，并将正白旗收归皇帝，^⑩曹家自此成为皇属上三旗的包衣，其旗籍是内务府旗鼓佐领下包衣汉姓人，或称内务府包衣汉军人，既属内务府管理系统，又属正白满洲旗。亦即，曹家虽隶满洲旗

① 《清世祖实录》卷41，第332页；卷46，第365页；卷63，第490、493页。吴辅宏等纂辑：《大同府志》卷1，《中国地方志集成》景印乾隆四十七年重校刊本，第10页。

② 在顺治十二年十一月的实录中，大同府与阳和府两名称仍同时见于文献。参见《清世祖实录》卷94，第742页；卷95，第748页。铁保等：《钦定八旗通志》卷208，第16页。

③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2、13页。

④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7—12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209—210页；《清世祖实录》卷116，第905页。

⑤ 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景印康熙二十九年刊本，第1页。

⑥ 曹玺时任江宁织造三品郎中加四级，由于京官准照加级请封，而内务府外放官员视同京官，故他可用一品的职级封赠。参见朱南铎：《关于〈辽东曹氏宗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05—421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98年增订本，第212、223—224页；Wolfgang Franke, "Patents for Hereditary Ranks and Honorary Title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Monumenta Serica*, vol. 7, 1942, pp. 38-67.

⑦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景印同治年间钞本，无页码。

⑧ 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卷6，第1—3页；卷13，第8—9页。

⑨ 先前学者有误曹世选在振彦任浙江盐法道时尚存，如见朱南铎：《关于〈辽东曹氏宗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

⑩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201—205页。

分,但并不表明可归作“满洲人”,他们亦非汉军旗下的汉军旗人,而是介于此两大群体之间。^①

据记事止于雍正朝的《八旗通志初集》一书,正白旗包衣下第五参领所属第三旗鼓佐领的设立过程为:

国初编立,始以高国元管理;高国元故,以曹尔正管理;曹尔正缘事革退,以张士鉴管理;张士鉴故,以郑连管理;郑连缘事革退,以曹寅管理;曹寅升任江宁织造郎中,以齐桑格管理;齐桑格故,以内务府总管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年老辞退,以内务府总管尚志舜管理;尚志舜故,以员外郎尚琳管理。^②

知此一旗鼓佐领成立于“国初”(略指天命之前,见后文),初或由张良弼(士鉴之父)和曹振彦担任旗鼓;顺治之后,则由高国元、曹尔正、张士鉴、郑连、曹寅、齐桑格、尚志杰、尚志舜、尚琳等人依次管理。各任佐领之家族均同为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八旗各包衣佐领的管理者均非世袭,常择籍隶该佐领中人担任,但有时亦会从同旗之人选派,内三旗中且有跨旗调派的情形。又,各包衣佐领遇外放(如离京任职织造库或往守陵寝等)、出包衣籍、拨隶公主及郡王属下、或担任内务府以外职官时,依例即应卸任。

由于雍正七年(1729)的《内务府满文奏销档》中直指曹振彦之孙曹宜隶属于“尚志舜佐领下”,而当时尚志舜正管理正白旗包衣下第五参领之第三旗鼓佐领,因此此佐领应为曹家旗籍之所隶。^③无怪乎在清廷入主中原后,曹雪芹家族曾两次管理此佐领,而曹振彦或早于天聪朝即已管理过此牛录。也因为如此,当曹雪芹的姑姑于康熙四十五年嫁与镶红旗王子纳尔苏时,即曾“蒙恩命尚之杰(应为时任内务府郎中且隶属同一佐领的尚志杰——引者注)备办”。^④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曹雪芹家族曰: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颀原任郎中,曹颀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祐现任州同。^⑤

曹家乃该书卷74—80中所列883个满洲旗分内尼堪(满语指汉人)家族之一,其中共有813(92%)家为包衣;含包衣旗鼓人227家,包尿管领下人332家,此外,还有254个家族或因具体资料不详,仅笼统称之为包衣人。^⑥至于诸尼堪入满洲旗的时间,只粗分成三类:“国初来归”者63家,“天聪时来归”者71家,“来归年分无考”者749家。其中所称之“来归”,应多属史家冠冕堂皇的修饰语,实情常是遭掳掠。^⑦

①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15—35、95—102页;杜家骥:《曹雪芹祖上之隶旗与领主的多次改变:兼谈曹家旗籍问题》(未刊稿)，“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②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5,第90页。

③ 周汝昌先生误认曹寅和曹宜籍隶两不同参领,事实上,曹寅、曹宜、曹荃等堂兄弟均属于同一佐领。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9—190页;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511页;周汝昌:《红楼家世: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第152页;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67页。

④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2页。

⑤ 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年景印乾隆九年武英殿刊本,第8—9页。

⑥ 此感谢陈国栋先生的提示。

⑦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99—103页。

查《通谱》全书所列的约 3800 个家族当中，除“国初来归”约 1800 家、“天聪时来归”约 500 家、“来归年分无考”约 1400 家外，仅余 74 家是“康熙时自科尔沁撤回之人”、4 家“崇德时来归”、2 家“顺治时来归”，^① 知此书所载的氏族，绝大多数在皇太极于崇德元年称帝之前即已成为金国子民。由于“来归年分无考”的尼堪家族当中，有 84% “世居”在沈阳、辽阳、抚顺和铁岭，且“世居”此四城的尼堪家族当中，亦有 86% “来归年分无考”（参见下表），知“世居”此四城的“来归年分无考”之人，应多是天命三年至六年间金兵占领该地区时成为包衣的。唯因《通谱》中并无“天命时来归”之叙述，故疑努尔哈赤称汗时期（尤其是在天命三年以“七大恨”为借口征明之后）所掳掠的汉人，或因档案失载，亦多被归于“来归年分无考”。

又依逻辑推理，“国初来归”乃谓一连续之时段，其下限应不晚于天命朝；否则，就该称“天聪时来归”。唯因全书中“国初来归”之家族有高达约 96% 均属满、蒙的“勋旧世家”，故疑此语或主要用于努尔哈赤奠立称汗基业时期就已编旗的“佛满洲（又称陈满洲、老满洲）”。查《通谱》卷首，记索尔果于万历十六年率本部军民归顺努尔哈赤，并称其部众“俱世居苏完地方，系国初来归之人”，此或接近“国初”的上限。^②

至于尼堪“世居”的地方，以沈阳最多，共有 539 家，其次依序为辽阳的 94 家，抚顺的 73 家，以及铁岭的 28 家等等。由于当中竟然无一在关内，而当时理应有不少籍隶内地之人在关辽地区发展，因疑该书所谓的“世居”，有许多乃指其被俘或投降之处。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 74—80 中尼堪姓氏之分布表

“世居”地点	旗籍分类				“来归”时间			尼堪姓氏数	金国占领该地时间
	包衣旗鼓人	包衣管领下人	包衣人	非包衣	国初来归	来归年份无考	天聪时来归		
抚顺地方	13	17	36	7	10	61	2	73	天命三年四月
铁岭地方	3	17	7	1	5	21	2	28	天命四年七月
沈阳地方	184	180	171	4	23	473	43	539	天命六年三月
辽阳地方	18	45	18	13	13	76	5	94	天命六年三月
其他地方	9	73	22	45	12	118	19	149	
总数	227	332	254	70	63	749	71	883	

在顺治以后曾管理正白旗包衣下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之诸官员当中，《通谱》称其先祖高文举、曹世选、郑朝辅等人均“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疑此应指他们多是在天命六年三月沈阳失陷时或俘或降，虽然他们很有可能为当地人，但仍不可径用此一叙述来论证其籍贯。^③ 否则，很难理解为为何该牛录中表现突出者全都恰好原籍沈阳，因牛录的成员不太可能是以籍贯做为筛选之依据。

在记事止于乾隆朝的《钦定八旗通志》中，曹家所隶之佐领已改称为第五参领第一旗鼓佐

① 都兴智：《锡伯族源出女真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 36，第 6—7 页；卷 55，第 20 页；卷 57，第 15 页；卷 60，第 3 页。

② 《满洲实录》卷 2，第 71 页；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 1，第 1、37 页。

③ 有谓《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体例较疏”，故认为其中所指世居之“沈阳地方”，仅为一概略说法，亦可理解成“辽阳地方”或“辽东地方”。唯因此书的总裁鄂尔泰，也负责编纂内容翔实的《八旗通志（初集）》，且《通谱·凡例》中的规范相当严谨，其对尼堪“世居”之处亦细分成沈阳、辽阳、抚顺、铁岭、长白山、锦州、大凌河、中后所、盖州、松山、三韩、海州、义州、开原、宁远等约二十处，知该说待商榷。参见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辨证》，第 124—126 页。

领，此一佐领在康熙中由尚志杰兼管，其家接着至少还有志舜、尚琳、保成等人曾管理过曹家所隶佐领。^①亦即曹雪芹家族败落后，其籍隶之佐领即多是由此一尚氏家族中人管理。

六、小 结

在曹雪芹家族移居辽东的先祖当中，以曹振彦最为人所知，且奠定了曹氏约百年的家业，此故，在雍正十三年追赠振彦的诰命中，即称扬他“启门祚之繁昌，华簪衍庆；廊谿铃之绪业，奕叶扬休”。^②唯先前对其生平事迹的论述仍有许多讹漏之处，本文即尝试整合出一较正确且完备的历史图像。

曹振彦与其父辈在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沈阳城破时被俘归旗成为包衣；^③初应隶努尔哈赤亲领之正黄旗，天命八年正月（或更早些）后归新旗主多尔衮，十一年八月随多尔衮改旗而隶镶白旗。^④振彦于归旗之初可能以原明生员的身份在八旗官学中担任教习汉文的外郎；天聪三年，或因通过皇太极对全国前明生员的检定而升授教官；四年，可能以娴习满汉文且办事干练，而获得从政所需之实习资格，成为致政；稍后，出任多尔衮属下的旗鼓牛录章京，负责统领汉姓包衣提供旗下的各种总务或后勤支援；八年，疑因协助处理孔有德、耿仲明以及尚可喜等明将投降事宜有功，加半个前程。崇德元年，因行贿刑部官员被拟鞭八十；八年，由于两白旗互易旗纛，而改隶正白旗，旗主仍是多尔衮。顺治元年之前，其旗鼓一职或遭“缘事革退”。

清朝入主中原之初，随着大量旗人的“从龙入关”，曹振彦也举家迁往北京，并在圈地政策下，于顺治三年受田顺天府的宝坻县（现为天津市一区）之西。^⑤稍后，振彦决定应试出仕，并因考取八旗贡士而得以东山再起；顺治七年，获授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八年二月，因已故的多尔衮被追论削爵，正白旗遂遭皇帝收归自领，曹家自此成为上三旗包衣；九年，振彦升阳和府知府；十二年至十五年，历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卒年不详。

虽然，清初有少数包衣（如尚志杰即在征讨吴三桂叛清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勋功）曾以武职立下战功，唯曹振彦应非如先前许多学者所称是以军功起家。^⑥他初为俘虏，但凭借其汉文学养和日益精进的满语能力，渐从包衣中崛起，而他所确切担任过的教官、致政、旗鼓（长史）、知州、知府、运使等职，均明显不是带兵打仗的武官衔。

皇太极于崇德元年称帝时，大清总人口约百万，^⑦而其基业主要是由记载于《八旗满洲氏族

① 尚氏家人的生卒年和事迹，参见尚凝祥：《思源堂尚氏宗谱》，道光五年刊本，笔者感谢刘小萌先生提供此谱残本的复印件。

② 此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初版，第422页。

③ 笔者将另文讨论其父辈的生平事迹以及迁徙至辽东的过程。

④ 杜家骥：《曹雪芹祖上之隶旗与领主的多次改变：兼谈曹家旗籍问题》，“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⑤ 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01—118页；曹寅：《楝亭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康熙未刊本，第4—5页。

⑥ 冯其庸先生推测曹振彦曾于顺治六年二月随多尔衮征讨在大同叛变的姜瓖，并因功获授山西州知州。唯当时振彦已自旗鼓牛录章京去职，且文献中仅称曹玺从征山西，疑振彦之所以知吉州，应是因其获得贡士所致。参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2008年增订本，第323—325页、第340—341页；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9—12页。

⑦ 此据天聪七年王文奎之奏疏。参见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第32页。

通谱》的约 3800 个家族所共同缔造，其中地位最低下的汉姓包衣共约 800 家，曹雪芹家族就是相当典型的一家，先后共有振彦、尔正、寅、宣、顺、颀等四代六人担任过包衣佐领或参领。^①曹家且因籍隶内三旗，曹玺之继妻孙氏得以被选为康熙帝玄烨幼时的保母；曹玺及其子寅、宣等，亦得以“佩笔充侍从”或“禁中任侍卫”。^②曹家子弟也分别在内务府下出任各种文职或武职，并因尽心王事而备受宠眷，玺、寅、颀、颀等三代四人均获授江宁织造之美缺；曹寅更历官至“管理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五级兼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康熙帝六次南巡当中，即有四次是由曹寅在江宁织造署接驾；^③当曹寅之女嫁与镶红旗平郡王纳尔苏时，亦获特旨由内务府郎中协助备办婚礼。但在雍正帝即位后不久，曹颀被控骚扰驿站、亏空帑项、转移财产等罪而遭籍没。^④也就在此一从俘虏之悲惨、织造之绚烂、抄家之潦倒的曲折家世下，以及身处满汉两族群夹缝所萌生的多元认同中，^⑤酝酿出曹雪芹写成不朽名著《红楼梦》的特殊环境。

先前学界的曹学研究虽早已超过半个世纪，积累的成果十分丰硕，许多资深红学家亦纷纷将论文集结出版；然而，在坊间汗牛充栋的著述当中，却也常令人感受到各说各话的现象。其实，曹学范畴中仍有许多关键处一直无法突破，且有些精致的个别观点，也或因学界间的角户分门，而未能在主流的曹学拼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本文所提出的看法与论证尚有待学界的检验，但希望能至少说服大家：“e-考据时代”的出现，已使文史学界的研究环境与方法面临千年巨变，我们有机会在先前的厚实基础上，给新曹学以强而有力的发展动能。

牛顿曾在 1676 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我看的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过往的曹学研究者虽彼此不断辩难，甚至争论到面红耳赤，但他们也不自觉共同塑造出目前曹学所拥有的巨人形象。^⑥当 e-考据有可能提供我们一把爬上巨人肩膀的新梯子时，如何睁大眼睛看得更远，并讲出一个精彩的故事，仍是文史工作者身上应肩负的重任。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辑：李红岩〕

① 朱淡文：《曹顺小考》，《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

②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98年增订本，第31—39、198—199、209、219—220页；刘上生：《佩笔侍从：曹寅“为康熙伴读”说辨正》，《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342—349页。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94页；周汝昌、严中：《江宁织造与曹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1、105—124页。

④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87—113页；马国权：《论曹俯被革职抄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期。

⑤ 曹家在成为包衣之后，肯定与清初许多辽人一样，经历一段深刻满化的过程，但在入关之后，则又重拾其祖先的文化传统，逐渐开始汉化。参见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1998, pp. 123-155; 黄一农：《吴桥兵变：明清鼎革被忽视的一条重要导火线》。

⑥ 如笔者在 2010 年 6 月访问周汝昌和冯其庸两位前辈时，发现他们对《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上的“教官”和“教官”之争，仍耿耿于怀。其实，不论孰对孰错，均不减损其在曹学中的贡献。